



国家标准固然可以颁布,但怎样衡量并在高校办学实践中应用国家标准又是一大问题。如果操作过程中可以有造假、蒙混过关的行为,其结果不可能是公正合理的。

本科质量“标准”有何依据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在管理者的圈子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流公司做产品,二流公司做品牌,一流公司做标准。”由此可见,标准掌握在能够影响行业发展的实体中。

几乎每个行业都离不开标准,可谓“无标准不立”。中国的高等教育自然也不例外。

就在 10 月底,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在 2016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年会暨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透露,教育部将于今年年底、明年年初颁布实施全部 92 个本科专业类的教学质量标准,作为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国家标准和基本要求(以下简称国家标准)。

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引来了众多关注。对于即将出台的国家标准能够给本科教学质量带来什么影响,人们充满了期待与疑问。

国家标准即将低调出台

“我所理解的检验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的标准,就是本科教学评估。”北京某高校教师王丽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王丽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本科生教学质量、人才培养并没有系统的标准,只有原则性的要求,以及本科教学评估。然而,本科教学评估又因过度关注量化指标,甚至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遭到一定诟病。

对于即将颁布的本科专业类国家标准,由于之前放出的风声并不多,不少人听闻都感觉到很意外。那么,国家标准的出台,又是经历怎样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呢?

记者了解到,2010 年 7 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首次提出要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建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2012 年 3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了制订实施本科和高职高专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并鼓励行业部门依据国家标准制订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评价标准。

据 2014 年 4 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召开的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研制工作会议透露,标准研制工作自 2013 年 7 月启动。

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明确了标准的定位是本专业类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要求,不能把目前已经开设专业的现状作为标准的底线。研制标准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省、行业部门(协会)和高校联合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标准,促进各高校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本校实际制定各专业人才培养标准,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教育行政部门通过标准来规范、监管高校的办学,规范专业的准入、建设和评价,引导高校推进改革、提高质量。

按照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进度,今年 7 月 1 日前,要完成标准的初稿;并陆续面向所有教指委委员、本专业类标准涉及的所有高校征求意见;于年底将各专业类标准提交有关部门编辑出版。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本科专业,是否都需要国家标准

对于国家标准的出台,不少高教人士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码要求,这样的标准早该出台;忧的是国家标准的专业性该如何保证?标准与新办专业、就业等关系又该如何理顺?

毕竟,由国家颁布的本科教学质量标准,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先例。国际上类似的标准,大多是由大学联合体或行业协会发布,并在一定范围内被认可、接受的。尤其是一些与行业相关的专业,如临床医师、工程师、商学院的人才培养都是由相关行业建立起一套国际论证体系来认定的。

由国家来颁布标准,专业性能否得到保证?遭遇了部分质疑。

上海大学原副校长叶志明给记者举了个例子,前几年,我国政府推行的卓越工程师计划,当中也涉及了一些培养标准。当时设计了学校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其中,上位的标准包含下位的标准,“按照这个道理,最高学府的专业标准将包含了其他学校的一切,而事实上,标准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像这种不结合实际的书斋式标准,最后并没有被采用。

而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看来,不由政府发布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由政府发布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是由国家统一管理的,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只不过发布的主体不同而已,其要达到的目的、发挥的作用都是相似的。

除此之外,我国的本科专业有几百个,此次仅完成了 92 个本科专业类的教学质量标准,是否每个专业都要制定国家标准,目前还是一个

未知数。

别敦荣、叶志明均表示,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有关学、理、工、商、医等,不同学科门类的办学要求并不一样,办学要求清晰,与社会需求直接相关的专业(如工科类专业),要制定国家标准并不是难事,但是还有大量专业是理论性、学术性、基础性的专业,这些专业很难用比较统一的标准来规范,更多的是要依靠高校发挥自主性,利用自身的优势、特色办好专业。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专业都需要国家标准。”别敦荣如是说。

专业准入,国家标准与《高教法》冲突

在 2014 年 4 月的那次会议上,教育部高教司提出,“标准”要力争成为专业准入标准、专业建设标准和专业评价标准。若有困难,也要成为专业准入标准和专业建设标准,最低要求是作为专业准入标准。

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开设新专业是高校的自主权。但现实中,专业并不是高校想办就办的,开设在专业目录中的专业需要备案,预警专业需要审批。

别敦荣表示,部分新专业的开设需要政府审批还是很重要的,过去政府审批没有明确的标准和依据,虽然也有专家评审,但因评审缺乏明确、系统的标准和依据,设置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有了国家标准,未来的专业设置可依标准进行审批,这对于专业审批是有所帮助的。

叶志明则提出了一重担忧,如果把国家标准作为专业准入标准,那是否还需要专业备案或政府审批?比如,有些需要控制的预警专业,部分高校会以办学实力远远超过国家标准为理

由,要求自行开设。“国家标准出台之后,政府该怎样对专业进行管理是需要理顺的”。

另一个老问题,可能仍然会存在于新专业申报中。叶志明指出,高校申报新专业,并不是所有条件达标才申报,它往往会把老专业的资源嫁接到新专业的申报中去,通过集中资源实现达标的目的。比如,一所高校原先设有计算机专业,现在打算申报软件工程专业,但是师资及其他硬件不足,高校就会通过资源嫁接的方式,平移资源,出现“人还是这人,设备还是那些设备”的现象。如果一年内不同时申报若干专业,连着三年是可以申报三个与计算机相关的专业。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学科评估中,一所高校有 10 个相关学科最后参评的却只有 2 个,举全校之力参评的学科在全国排名前列,但这样的参评是有水分的,也对其他高校不公平。

“如果操作过程中可以有造假、蒙混过关的行为,其结果不可能是公正合理的。颁布了国家标准之后,上述问题同样存在,国家标准固然可以颁布,但怎样衡量并在高校办学实践中应用国家标准又是一大问题。是统一衡量,还是按个体衡量?如果是按照后者,永远可以以上述方法来实现达标。”叶志明指出问题所在。

保底标准,能否被就业市场认可

叶志明研究团队曾做了八年上海高校博士、硕士、本科、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分析的大数据平台。在多年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同一个专业的各高校毕业生的行业流向是很不相同的。“这个‘不同’也反映了,有无严格的专业标准,高校所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的流向是完全不一样的。”叶志明说。

学生所找的工作都与本专业无关,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底算不算符合国家标准?同时又怎么看待符合国家标准的毕业生,却不被就业市场承认的现象?由此反推国家标准的设定,也是很值得耐人寻味的。

就目前教育部所透露,此次颁布的国家标准系本科专业的基本要求、保底标准。那么,按照保底标准培养出来的本科人才,能否被就业市场认可,值得众人打一个问号。

说到国家标准与就业的对应关系,别敦荣认为,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涉及了高等教育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学生的培养质量即便获得了国家标准、学校的认可,但用人单位就是不聘,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

“国家标准是指导性的,但具体到高校办学,还要顾及学生的多样性、多方面能力的发展,以及非专业能力。其中,迁移能力——从一个专业迁移到另一个专业,从一种职业迁移到另一种职业的能力很是重要。如果没有这项能力,学生即便按专业培养之后素质很高,但保不准若干年后工厂倒闭、生活场所搬迁所造成的暂时失业。因此,国家标准并不是为了培养某一职业而设定,学校也不应该只盯着国家标准培养人才,还需要关注学生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发展。”别敦荣说。

现场

给创新以自由独立的空气

——北京论坛聚焦制度改革

■本报实习生 田思敏 记者 温才妃

钓鱼台国宾馆前的银杏叶又黄了。这里是北京有名的银杏大道,片片杏黄摇曳在冬日暖阳中,不仅秒杀非林无数,也将 300 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及各界领导吸引至此。

11 月 4 日,2016 年北京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开幕。与会者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互信·合作·共享”为主题,共同探讨文明在促进全球互信合作、资源共享中的重要作用。

据悉,北京论坛创办于 2004 年,是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迄今为止,已有来自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700 多位政要、知名学者参加了这一学术盛会。

12 年执着共同繁荣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北京论坛迎来了它的第十三届开幕式。在过去的 12 个春秋里,论坛展现出了朝气蓬勃的发展态势和生命力。

在开幕式上,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伊克巴勒·里扎、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韩国 SK 集团全球董事长崔泰源和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分别致辞。

谈起举办北京论坛的目的,林建华表示,希望由北京大学主导创办的北京论坛,能打造一流的平台、建构一流的合作,从而更好地培育一流人才、研究一流学问。“为新思想的孕育、新技术的诞生创造更多可能,为人类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探索更多的现实路径”。

事实上,自 2004 年创办以来,北京论坛已经走过了 12 个春秋,12 年来论坛得到了世界各国学术界、思想界、高等教育界的高度关注,展现出了朝气蓬勃的发展态势和生命力。论坛开幕式主持人、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谈起北京论坛的今天,倍感欣慰与自豪。

“北京论坛用 12 年时间向全世界表明了一个主题,即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种亲人类善邻、协和万邦的价值追求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也是数千年来的社会理想追求,更是全人类共同向往和追求的价值体现。”朱善璐说。

回首走过的 12 年,北京论坛不仅始终牢记宗旨,勇担使命,而且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十余年来,北京论坛倡导‘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既探索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也关注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合作;既研讨人类社会发

政府与教育的边界不应被打破

驱车赶往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已经是下午 2 点。在分论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制度的视角”上,与会人员正在热烈地讨论着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如何深化教育改革的问题。

林建华表示,在内部机制上,大学教育与政府改革息息相关。政府在实行支持计划,促进大学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以前,国内大学在争建一流大学的时候,大多采用并校、办新专业、办新系院、扩大招生规模和校区规模的方法,学校固然变得大而全,但相应的质量也有所下降”。

林建华认为,尽管中国大学在数量上有了巨大的扩张,但在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准上,变化并不像数量变化得那么快。“这正是政府和高校下一步需要重点考虑解决的问题”。

而从外部机制的角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格伦·A·琼斯认为,行政权力不应凌驾在学术权力关系之上,大学应当有较为自主的决策

权。“在加拿大,大学是由各个省作为私有的公司形式建立的,它们不属于政府,但受政府的监管。实际上,政府作为重要的投资方,对大学的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格伦·A·琼斯看来,太多的管理和监控会使得大学的创新能力窒息,使得学校无法作出正确的决定。“并不是说政府完全不管大学,但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下,政府应该做的是减少自己直接的管控和干预,让大学能够更多地享有自主权”。

对此,林建华也支持意见。他提出,政府和大学是各自独立的实体。大学想要成为一流的大学,就需要院校自主、学术自由。“只有在充分自由的环境下,大学才更有创新性,才会产生更平等的教育机会。政府和教育的边界是不应当被打破的”。

办学不应为排名所引导

大学之独立精神,一直为高教人士所津津乐道。当大学受到诸如排名榜这样的“外力”所左右之时,应当如何在自主权、问责与学术自由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呢?在分论坛现场,专家就此掀起一阵热议。

宾州州立大学教授罗杰·L·盖格、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肇基、伦敦大学学院教授西蒙·马金森、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院长劳埃德·迈纳四位国际著名学者在主旨演讲中都认为,大学办学不应该为排名所引导,大学应当保持自己的组织特征和必要的传统。



分论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制度的视角”现场

“如今,人们通过排名定义哪些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社会、政府和捐助方都非常关注大学的排名,这是十分荒谬的。”香港科技大学的创始校长吴家玮举例说,“美国伯克利大学有 3.8 万名学生,而加州理工大学才 2000 名学生,洛克菲勒大学更是只有 150 名学生,这要怎么比较?这些学校难道不算世界级的吗?”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对世界大学的排名现象也表示了质疑。他认为,对于大学来说,哪怕是同样的排名体系,它们的排名也可能非常不同,排名的基准也不一样。“现实中,有的排名基于专业人士的知名度,有的基于学术信誉以及研究的产出和质量,还有的基于教学的质量、资源,以及学生的满意度。这就导致了排名的混乱。”

事实上,应该评估大学的哪一方面?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标准?又该由谁来使用标准?这仍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周雪光建议,可以通过了解不同社会背景、不同组织的社会认可度来进行评估。“排名是一个建立共识的过程。从一定角度看,排名的社会认可度越高,排名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合适性也就越高。”而这或许也为中国的第三方机构发展指出了一条出路。

中国大学评论

明年,我国将实施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国家标准。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 10 月 29 日在 2016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年会暨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透露,教育部将于今年年底、明年年初颁布实施全部 92 个本科专业类的教学质量标准,作为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国家标准和基本要求。

实施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国家标准,最需要解决的是高校如何将人才培养作为核心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高校“重视教学”“重视人才培养”就会泛化、抽象化。表面上,在专任师资比例、学校实验室图书馆配备、课程开设上都达到国家标准,但是教师的心思却用在科研上,实验设备被闲置,一些课程只是“挂羊头卖狗肉”。

林蕙青指出,“学生和教师不是符号和数字,高校要深入、具体地推进人才培养工作。”这表明,教育部领导对高校的人才培养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确实,当前有的高校就是把学生和教师视为数字,在数字上达到评估、考核要求就行,求量不求质,这和高校盛行数量考核指标有关。包括在科研上也实行数量考核,只是相对于科研数量考核可体现学校办学政绩来说,高校对教学采取的数量考核基本上是教师工作量的要求,对教师的教育投入、教学创新、教育效果并不关注,对学生则只关注毕业时的就业率、考研率,而忽视过程培养和过程质量监督,这一问题不解决,就是实行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国家标准,高校也只会关注如何在数量上达到国家标准,难以解决本科教学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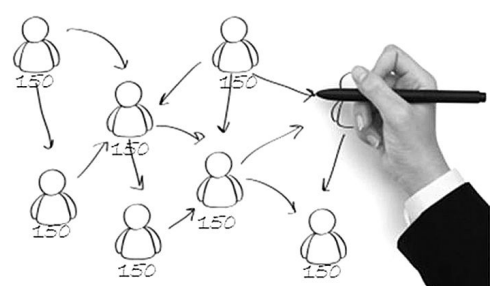
而解决这一问题,在实施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国家标准时,需要推进高校进行三方面改革。一是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给学校自主设置学科、专业、课程,开展特色教育教学的权利。高校没有自主权,就会千校一面,迷失办学目标和定位。近年来,一些学校为何追求高大全,想办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不愿安于自身定位,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就是因为学校没有自主权,学校办学领导追求政绩。而众所周知,“数字出官员,官员出数字”,在学校,校长是官员,学校办学行政化的环境中,这一逻辑在高校领导中也适用。

二是在高校内实行教育与学术本位管理,对教师的教育能力与教育贡献实行教师同行评价而非行政主导的评价。目前,高校对教师的评价、考核是由学校行政制定评价标准,再由行政部门组织实施。因此,评价特别重视可以展示的学术成果,诸如论文、课题、经费、获奖,却对教师的工作状态、教学过程不关注。这不但引导教师功利地对待教学与科研,而且也功利地对待学生,在评价、考核学生时,没有过程管理、过程评价,而只是学期末进行一次考试。针对这种教学评价、管理方式,加之教师上课不投入、枯燥乏味,有的学生就逃课,请他人替课,考试前临时抱佛脚。

只有实行教师同行评价,才能扭转这种情况。在国外世界一流大学,给本科生上课是对所有教授的基本要求,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例外。教授给学生上课,如果是大课的话,要配五到六名助教开研讨课;同时,每门课在学期中,要求学生读八九本参考书(针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针对理工科则要完成规定单元实验),对学生进行三到四次考试(或撰写三到四篇课程论文)是很普遍的。这让国外学生都深感学业压力大,我国留学生甚至感慨国外大学每年都像国内读高三。

三是建立学生淘汰机制,实行宽进严出或严进严出,以此确保每位拿到学位的本科生货真价实。我国已有部分学校对学生进行淘汰,但是,淘汰机制还不健全。主要原因是这是学校对学业不合格学生的单向淘汰,而非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包括进大学时,学校自主招生、学生自主申请,拿到多所大学录取通知书再选大学;进大学后,自由申请转专业和转学,如果对学校和专业不满意的话,学生可提出申请。这就让大学也面临被学生选择的压力,也给被大学淘汰的学生其他选择的机会。在这样的办学制度下,大学不敢不重视教学质量。这就是美国不少社区学院也有一流的教学水平的原因,这些学校靠一流的教学,更低的学费吸引学生选择,从本校修读两年获得副学士学位后,可以申请转学到其他院校,包括名校。

提高我国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是一个已经谈了二十多年的话题了。近年来,一些高校也出台了人才培养改革措施,包括小班化教学、探讨式教学,改革标准化百分制评价,实行等级评价等。落实这些措施,都需要教育部门和学校进行系统改革。而前述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实行教师同行评价,扩大学生选择权的改革,都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有明确提及,这需要教育部门、高校贯彻落实。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高校怎样才能不把师生视作数字

■冰启